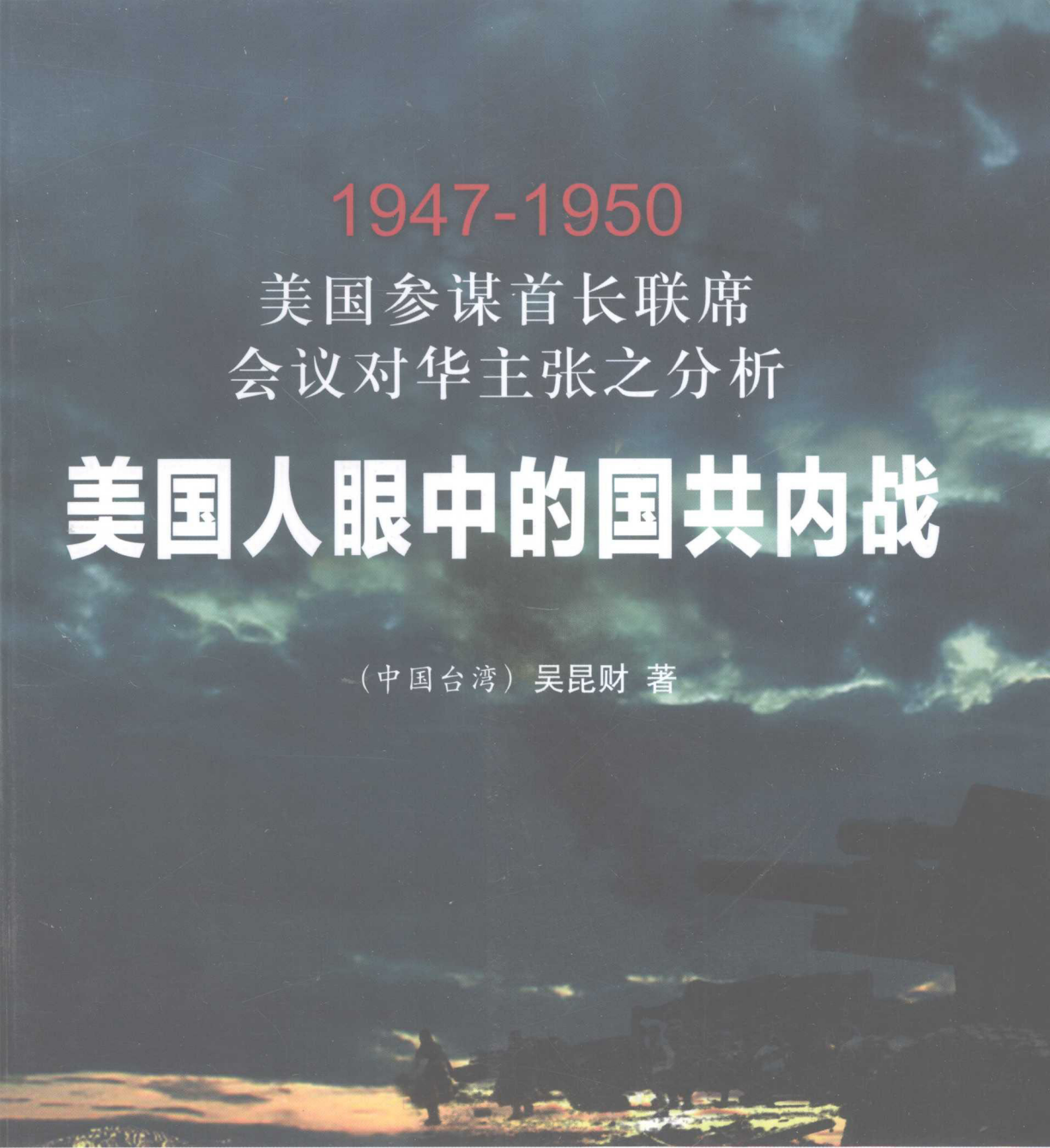




1947-1950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
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

(中国台湾) 吴昆财 著

援蒋还是弃蒋？

发动朝鲜战争？

美方与国务院的博弈



1947-1950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
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

(中国台湾) 吴昆财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 : 1947~1950 / 吴昆财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108-1256-9

I. ①美… II. ①吴… III. ①对华政策—研究—美国—1947~1950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8281号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 (1947-1950)

作 者 吴昆财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256-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 1
-----	-----

第一章 文献分析	／ 7
----------	-----

第一节 有关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著作的研究分析	／ 10
-----------------------	------

第二节 中美关系相关著作的分析	／ 14
-----------------	------

第二章 战后美国的全球主义与围堵政策	／ 33
--------------------	------

第一节 肯楠的围堵理论	／ 37
-------------	------

第二节 杜鲁门主义	／ 42
-----------	------

第三节 马歇尔计划	／ 46
-----------	------

第四节 国家安全会议第 68 号文件	／ 48
--------------------	------

第三章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	／ 55
----------------	------

第一节 从临时至正式单位	／ 56
--------------	------

第二节 杜鲁门总统的修法	／ 74
--------------	------

第三节 高华德与尼可拉斯法	／ 76
---------------	------

第四节 高华德——尼可拉斯法后的美国军事发展	／ 83
------------------------	------

第四章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政策计划处对华主张异同之分析	／ 91
第一节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与特质（1947～1948）	／ 91
第二节	关键的 1947 年	／ 97
第三节	没有中国政策的 1948 年	／ 106
第四节	军方与文人对华主张的冲突	／ 114
第五章	关键时刻的对台主张（1949～1950）	／ 131
第一节	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期	／ 132
第二节	放弃台湾（1949 年）	／ 136
第三节	中立台湾（1950 年）	／ 157
第六章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在华军事顾问团	／ 173
第一节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源起及其成立过程	／ 173
第二节	美国在华司令部的撤离	／ 181
第三节	1946～1948 年的美军顾问团	／ 187
第四节	美国在华联合军事顾问团（Joint U. 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JUSMAGCHINA）	／ 196
第七章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与布莱德雷对华主张之分析	／ 203
第一节	李海的对华主张	／ 205
第二节	布莱德雷的对华主张	／ 213
结 论	／ 223	
征引书目	／ 227	

绪 论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文主要在探讨美国军事单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于1947~1950年,在对华政策制定上所扮演的角色。为何选择研究这个军事单位,动机主要有三:

其一,中美学界在研究1947~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时,大多着重对国务院的探讨,而少有分析军方之角色与态度。故美国军方在对华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有进一步研究价值。

其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具有外交与军事的两重角色。当代知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经归纳杜鲁门(Harry S. Truman)时代对外关系的四股主要决策者:(一)杜鲁门总统本人;(二)外交体系中的高层领导阶人,如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以及艾奇逊(Dean Acheson)等人;(三)国务院中的单位如政策计划处(Policy Planning Staff),与职业外交人员如肯楠(George F. Kennan)等;(四)军方。^①这四股主力构成杜鲁门政府的外交团队,其成员的专业背景可以区分成军事与外交层次。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以军方的身份,却同时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所以此机构的双重性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79~382.

质，亦颇值得研究。

其三，在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上，军方较国务院要来得友善。^①不论是对国府在大陆时期，或是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方战区司令等，都比国务院对国府要来的友好（友善的原因容待后叙）。故军方对中国与国府的考虑，也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上述的三种动机，本文将就1947～1950年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主张与态度深入分析，并探讨其与国务院的互动关系。

二、研究文献与范畴

本文所采取的文献资料来源有三：其一是政府出版品、档案，如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档案，以及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等。其二是重要当事人如李海将军（William D. Leahy）、马歇尔、杜鲁门以及艾奇逊等人的个人著作、传记等。其三是专书与研究成果。

在政府出版品以及档案方面，最主要的史料有二个，其一是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其中收录不少有关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中国的重要文献。不过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由国务院所出版，所以收录文献的观点以外交系统为主，军方的意见则属次要。其二为 *Record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② 此批档案由 University Publication America, Inc. 以微

^① 事实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两大流派，而以后者为主。理想主义本来就不是美国外交的主轴，类似赛珍珠（Pearl Buck）对中国所怀有的特殊感情，或者二十世纪初，美国传教士曾想把中国基督教化的理想主义，在外交政策并不多见。美国的立国者警告，在进行外交政策时，不可以对于特殊的国家进行长期与顽固的敌对态度。同时也不可对其他国家赋予永久的感情，换言之，就是要尽力摒除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曾在著名的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中，明白告诫美国民众：“一国对于他国有热情的喜爱，也一样的能产生各种坏处。由于对于所喜爱的国家的同情，遂幻想彼此有共同的利益，实则所谓共同利益仅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于是把他人的仇恨灌注于自己，结果遇他国与人发生争执或战争时，自己并无充分的理由，而亦陷入其中……我们处理外国事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与他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孙同勋译，《不朽的美国历史文献》（台北：新亚出版社，1976年），48～49页。

^② 至于国府档案中有关美国军事顾问团，可以参考“国史馆”的所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便和美方数据互证，尤其本文在第六章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中，会运用《蒋中正总统档案》作为佐证。

卷的形式发行。此微卷中的第二部分包括 1946 ~ 1953 年的远东，其中主要为战后的中国。此微卷主要是根据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内容除与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重叠部分之外，另有如联合军事顾问团等史料。

除官方的史料以外，也参考重要人物的著作，除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等人外，此时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两位成员也有个人作品。其一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首位临时主席李海（William D. Leahy）的 *I Was There*。此书虽然以二战结束之前为主，不过文中涉及不少作者对中国、蒋介石的意见。其二为布莱德雷（Omar N. Bradley）的 *A General's Life*，布莱德雷是这个单位首任的正式主席，他于 1949 年接替李海成为正式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华政策，尤其是对台的评估上，扮演着主导的角色。至于专书与研究成果，容后再叙。

由于过去中文学界对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介绍与讨论均很少，故本文对此一机构，也作一概略的探讨，以便于呈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特质。

此外，除了对此机构之发展、组织、职掌加以探讨外，本文亦对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中之灵魂人物——主席加以分析，因该组织的主席能出席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军方专业立场表示意见，故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主席的角色特别值得注意，而在此期间的二位主席李海（1942 ~ 1949）、布莱德雷（1949 ~ 1953），均在对华政策上有特别的立场，故本文除分析该组织的整体对华态度外，亦将另辟专章分析李海与布莱德雷的对华态度与主张。

本文的研究断限是 1947 ~ 1950 年，所以选择这四年进行研究，原因有二：

（一）1947 年正好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正式成立，该组织被法律授权可以参赞总统进行外交与军事的规划。

（二）1950 年则是韩战爆发，韩战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不过本文限断的前后数年，其他的事件若与本文相关也会加以分析。

三、章节安排

本文除绪论与结论外，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是针对文献与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探讨。由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军事单位，美国学界对此机构的研究颇为丰富，故研究成果分析上，将以美方的著作为主。以时间为经，组织发展为纬，交叉讨论以呈现过去学界对此组织之研究。

第二章探讨战后美国的外交策略。将论述美国从战前的孤立政策到战后的全球主义，其间的转变过程是如何考量，同时美国在推展全球主义之际，如何面对来自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集团严峻挑战和重重阻碍。^①

第三章，则是分析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源起、成立、运作以及改组。

第四章，分析 1947～1948 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对华政策。由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能在杜鲁门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中表示立场与意见，因此掌握其对中国的看法，有助厘清华府的对华政策。本章将追索“参谋首长联席会议 1721 系列文件”（JCS-1721）、“国家安全会议第 22、34 号文件”（NSC-22、NSC-34）之拟定与内容，以评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美国对华政策之立场与影响。

第五章，分析 1949～1950 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对台看法。由于中共从 1948 年底，在大陆取得全面性的胜利，国府于是从 1949 年起，开始退守到台湾。国务院事实上已放弃台湾，有坐待“尘埃落定”之打算，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却在此时为杜鲁门政府提出它的对台主张。本章将讨论其在美国对台策略上之建议，并就此分析其在美国外交上之影响力。

第六章，论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如何规划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美国在华

① 孤立主义一直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外交的一个重要传统。就以一次世界大战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对外政策而论，华府希望透过二个方法维持全球的和平，其一是试图运用国际间所签定的条约，例如 1922 年在华盛顿所签署的四国公约、五国公约以及九国公约。其二则是希望利用各地区的主要强权，如在欧洲借重英国，在东亚则以日本为主。总之，在孤立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寄望运用这两种方法维系全球和平，其重要的考虑不外乎是要尽量避免美国卷入国际政治之中，以保持美国孤立的传统。

军事顾问团，对于战后中国军事的重整与建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除了代表美国愿意以军事方式协助国民政府建立现代化军队外，还象征美方对国民政府的支持。顾问团起源于1945年蒋介石主动向华府提出，却延宕到1948年11月，始在南京正式运作。不过当顾问团甫抵中国，国共内战已近尾声，致使顾问团未能发挥功效，并于同年12月就结束它在华的任务，离开中国。顾问团的规模、性质、任务等，可以说是由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手策划的。故借对此顾问团进行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探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对华理念。

第七章，分析首任临时与正式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和布莱德雷，其对国民政府的看法。根据规定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却不能逾越该组织的共同决议，换言之，主席的职权只不过在执行该组织的主张。但不同的主席，基于个人的对华主张，在该组织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影响力。故本章分析李海与布莱德雷两人的对华主张与态度，可以得出那一位的理念是较有利于国民政府。^①同时，由分析李海与布莱德雷，更可以显示此时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对华态度。

^① 这二位主席在对华政策上均曾展现个人的主张，前者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远大于后者，前者的理想色彩也远大于后者。其实，历来不少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者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也都是在理想与现实主义之间选择。举例而言，如同学者柯瑞（Roy W. Curry）在分析威尔逊总统的远东外交政策时，他指出威尔逊虽带有宗教理念与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究竟威尔逊还是抵不过远东地区的强权政治，最后是现实战胜了理想主义。Roy W.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7), pp. 311~322.

第一章 文献分析

1947 ~ 1950 年间,中美关系上产生了许多颇具重要的史事,其中有矛盾、冲突与合作,深深影响日后中美之间的互动。故中外学者曾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积极投注不少的心力,也有相当的研究的成果。例如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illiam W. Stueck,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Steven I.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June M. Grasso, *Truman's Two-China Polic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7); David M. Finkelstein,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 — From Abandonment to Salvation* (Marylan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等都是非常杰出的著作。本文在分析 1947 ~ 1950 年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上,主要采取下列三个方向:

第一是以时间的断限来取舍。本文在进行成果分析时,选取之对象主要时间断限集中在 1947 ~ 1950 年。不过许多著作都是横跨在此一时期之上,例如 Lewis M. Purifoy, *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 McCarthyism and the Diplomacy of Hysteria* (New York: A Division of Franklin Watts, 1976);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等, 亦将一并予以探讨。

第二是研究的领域。早期学者的研究根据所能掌握的史料, 往往把焦点放在政治、外交方面。例如, 学术界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把二十世纪初至 1930 年代的中美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① 其后, 学界又将焦点转移至战时的中美关系, 因为他们认为战时的中美关系, 关系到美国卷入日后东亚近数十年的外交与军事纠葛之中。^② 学者也关心到美国如何把中国带入国际政治体系之中, 罗斯福总统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战时国际会议与中美外交的关系, 以及美国如何援助中国, 对抗日本等,^③ 这些都属于政治、外交的范畴。故可见许多

①关于此时期的主要著作可以参考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7); Dorothy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Roy Watson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67); Arthur Waldron, *How the Peace Was Lost: The 1935 Memorandum — Development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2), 尤其是 Arthur Waldron 的著作值得注意, 此一著作主要根据曾于 1925 ~ 1929 年任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 (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在 1935 年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为主, 进而分析美国的远东政策。本书主要分成二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备忘录的背景介绍, 第二部分则是备忘录的全文。作者指出一个重要的论点, 马慕瑞认为日本并不是如当时美国大部分人所想象的, 是导致亚洲大战的恶棍。日本在 1930 年代的外交政策, 并不存在着军国主义思想, 而是一直希望遵守 1922 年的华盛顿条约。而它之所以会对发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 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行为不断地破坏华盛顿条约所致。而这些国家则包括中国与美国。Ibid., p. 2. 很明显的, 马慕瑞认为“九一八事变”, 错不应在日本, 而是亚太其他国家违反了国际条约, 这些国家也需负起责任。尽管马慕瑞的备忘录似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多所指摘。但如作者所言, 备忘录已成为此时外交事务的经典之作, 而柯立芝总统 (Calvin Coolidge) 更盛赞马慕瑞是“我们的最高中国专家”。Ibid., pp. 8-9. 质言之, 此书颇具参考的价值。

② 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5.

③ 关于国际会议与中美外交的关系, 可以参考, 李荣秋, 《珍珠港事变到雅尔塔协议期间的美国对华关系》(台北: 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 1978 年), Richard L. Manser, *Roosevelt and China: From Cairo to Yalta* (Pennsylvania: Temple University, 1987)。有关于美国对华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可参考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叶伟潜, 《战后美国军经援华之研究 (1946 ~ 1949)》(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1 年); 李文志, 《美援来华 (1946 ~ 1948) 之政治经济研究——历史结构的观点》(台北: 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9 年); 文馨莹, 《经

皆采传统研究途径,着重在分析政府间的外交关系。

但 1980 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的范畴有扩大之趋势,除传统的政治、外交领域以外,学术界把关注扩展到其他横向面上,例如同时期中美知识分子、新闻界以及教会等在中美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学术研究的范畴所以会有大幅度的进展,主要受到三项因素所促成:其一是科际整合,^①其二是史料开放已朝向自由化,^②

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90年),陈俊宏,《美国对华经济援助之研究(1937~1948)》(台中:东海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值得一提的是沈庆林的著作,此文与其他著作不同处,在于它不但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同时也全面的分析各国政府,乃至民间人士的对华援助,这在此研究范畴中是相当罕见而且突出的著作。

① 史学界大量运用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外交史学者借用威斯康辛学派的理论(Wisconsin School)。Nancy B. Tucker, "Continu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U. S.-China Relations Since 1945", 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14. 另外也可参考陈宝铃所著,《美国对华政策之研究(1947~1950)——以纽克特兰国家利益架构分析》(台北: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都是借用社会科学的例子。也有学者把触及面延伸到中国内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关于中国社会如何看待此阶段的中美关系,可以参见 Helen Esther Fleischer Anderson, *Through Chinese Eyes: American China Policy, 1945~1947*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80)。有学者则把焦点放在美国国会以及国内政治团体对行政部门的压力,关于美国国会如何影响行政部门的中国政策,可以参见 James Alan Fetzer, *Congress and China*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9)。同时,学界也越来越重视舆论所发挥的影响力。关于美国舆论界对于华府的中国政策,可以参考,张庆琪,《纽约时报的对华政策(1945~1949)》(台北: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年)。质言之,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范畴可谓是包罗万象。许多新的学科,新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被导入历史领域,以期突破传统研究的窠臼与限制,进而提出新的观点与创见。也因为这些科际整合的应用,与大量史料的解禁,使得1980年代以后的作品,往往更为成熟。另外一个差异点,就是1980年代以来的学者在分析研究时,除了注意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外,也非常重视政策制定时的文化、经济、心理与社会等诸多背景。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214.

② 无论是美国,大陆与台湾三方面皆有大量新史料的开放。早期由于此段历史的研究,存在诸多的禁忌,如事涉国家安全与军事机密,当事人皆还未谢世等因素,因而使得这时期的学术受到局限。虽然八十年代以后的两岸官方档案的逐步开放已有一定的成果,台湾方面也有档案法的制定。不过,就如同有中共学者所直言,现在中美关系史主要还得依靠美国的官方档案与私人资料。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学者建议,中共相关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分期地、分批地出版一批档案资料。汪熙、王邦宪著,《我国三十五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收录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美国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8页。总之由于时空的转移,当此阶段的人物逐渐走入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的减轻等,形成有利学术研究的大环境,遂促成诸多的官方档案史料以及个人数据的问世。许多学者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时空环境下,利用众多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撰述出不少与早期截然不同的作品。

其三是国际外交的和解。^①

第三是主要研究者的国籍,这以美国、台湾与大陆三个地区为主。本文在分析时,尽量把这三个地区,同时期,同领域的作品,作比较分析。

第一节 有关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著作的研究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最近几年来学术界中,有关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论著。^②此方面之研究以美国方面学者为主。若归纳有关撰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博士论文与专书,可分为二大范畴:(一)着重于分析这个组织如何参与美国全球战略的规划,以及区域性战争。(二)至于专书部分则集中在论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他们与上层领导阶级的互动,以及这个组织未来的可能发展。

第一个范畴主要以博士论文为主,包括:Lester J. Foltos, *The Bulwark of Freedom; American Security Policy for East Asia, 1945~195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80);^③ Ohn Chang-il,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U. S. Policy and Strategy Regarding Korea, 1945~1953*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3); Charles F. Browe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American Strategy*

① 由于国际社会上冷战的结束,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全球外交的舒缓,进入后冷战时代。大陆方面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借由新档案的公布,以及政治环境的放宽,有较周延与深入的学术性著作。汪熙、王邦宪著,《我国三十五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3页。另外,有关于此时期大陆学界的著作分析,可参考王成勉,《马歇尔使华调处日志(1945年11月~1947年1月)》(台北:“国史馆”,1992年),10~11页。虽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冲击,政治的气氛又趋紧绷,但还是有几位年轻、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从事学术性的研究与著作。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214。至于台湾方面,也受到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影响,政治环境的限制不再,学术研究的空间也受到相对保障。加上有不少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投入此一领域中,从而产生不少与往昔不同论点与范畴。

② 事实上,除了专著研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外,还有非常多的单篇文章与评论谈及这个单位,但限于能力与时间,所以本文不作介绍。

③ 作者在本文中详细研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如何规划战后的远东政策,所以对于想了解这个组织的对华政策,是颇有助益的。

and the War with Japan, 1943~194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7);^① Richard Yuping Wang,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on China, 1945~1949*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1987); Richard Mandel, *The Struggle for East Asia's Rimlands: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U. S. Far East Policy, 1921~1945*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等。^② 另外有二篇博士论文则分析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组织结构与制度, 这包括芝加哥罗耀拉大学 John C. Binkley, *The Rol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Making: Professionalism and Self-perceptions, 1942~1961* (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以及 Gwendolyn M. Hall, *Managing Interservice Competi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1992) 等。

第二个典范则以专书为主, 如果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演进过程来分析上述专书, 也可分成二个阶段, 而以 1986 年的高华德——尼古拉斯法案(The Goldwater-Nichols Act of 1986) 为分界点。1986 年之前的专书, 分析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时, 有两个注意的焦点, 即 1947 ~ 1949 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成立, 以及 1953 ~ 1958 年的重组期。而自 1986 年之后, 学界则多以高华德——尼古拉斯法案为研究对象。这些重要专书包括: Arthur O. Sulzberger, *The Joint*

① Brower 的文章提及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考量战后远东政策, 也同时注意到如何定位中国的角色。

② Richard Yuping Wang 的文章是目前唯一专论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博士论文。此论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 分析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 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如何规划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 (二) 作者分别以 1946 年的马歇尔使华与 1947 年的魏德迈调查团来诠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所扮演的角色; (三) 分析 1948 ~ 1949 年中国的危机, 美国的反应, 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作者的结论是, 虽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希望美国能够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 不过由于在这几年中,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所扮演的角色都是边缘的, 故其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有限。其时军事部门内的意见亦时有不同。所以在对华的决策过程中,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通常只在执行国务院所规划的政策, 而国务院才是对华政策的最后决定者。学界过去研究中美关系, 较少兼及军方, 尤其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角色。故此篇博士论文是把研究焦点放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上, 也注意到该组织在对华政策上扮演的角色, 这的确是一项新尝试。惟作者并没有充分突显该组织在对华政策上的主张与特色。

Chiefs of Staff, 1941~1954 (Washington D. C.: Marine Corps Institute, 1954);^① Lawarnce J. Korb,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② Schnabel, James F.,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Wilmington, Delaware: Michael Glazier, Inc., 197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③ Edward C. Meyer、Bernard E. Trainor, *The Reorganization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 Critical Analysis* (Washington D. C.: Perga-

① 此书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如何从无到有,如何从一个在战时的过渡性军事参谋组织,透过战后一连串的立法程序,转变为正式的军事单位。作者对此一长达数年的立法过程,和美国政府如何思考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国家安全上的定位,作出深入浅出的介绍。而从本书可以得知三项事实:其一,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设立及其合法化,是经过缜密的思考,以及长时期的演化后,其功能与职掌才逐渐确立的;其二,美国基于在战后的国防需要,乃有积极改组军事系统的构思。而这个组织刚好正是属于国防系统的一环,所以它也成为此波军事改革的对象;其三,美国此波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是以宏观的国家安全作考量。而此时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国家安全必然涉及到外交与军事两层次,所以加以整合,乃有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被赋予襄助如国防部长等,以及统合美国各种军事力量的职责。

② 本书有系统的介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二十五年的历史、人事变化、组织结构,以及这个组织的内部运作等。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是介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内部构造,及与政府其他部门(如国家安全会议)之隶属关系。不过作者对于此一组织的运作过程却有所攻讦,认为会议过程有二个缺失:一是程序过于烦琐;另一为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太过于本位主义,屡屡以各自军种的利益为考量前提。Lawarnce J. Korb,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p. 24。第二部分,为系统的分析1947~1974年间,总共二十八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成员。内容包含他们的军种、年龄、任期、出生地,以及由那位总统所任命和成员的小传等。第三部分,作者透过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尼克松等四个政府,诠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分析他们与国防部长、国会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则集中韩战和越战之际,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如何在诸多的危机中,执行军事与外交的顾问任务。作者在结论中对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未来角色感到相当的悲观。他认为未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将更甚于往昔,但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以及其后的修正法案,并没有统一军事事权,特别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故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成员在重要的议题上,经常无法口径一致。另外就是未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威望恐将远不如二战结束后的成员。例如艾森豪威尔能够在1953年打败对手当选美国总统,而越战的联军指挥官魏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却在南卡罗莱纳州长初选里败北。Ibid., pp. 179~181。

③ 亨廷顿在本书中,从军事组织角度来诠释,包括国防部、各军部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等军方单位,在政府策决过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军事组织和其他行政部门间的互动关系。他对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可以透过正式法律与非正式